

短期行为——潜在的腐败

林 亚

所谓短期行为，特指为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为个人或小团体利益而牺牲社会和国家利益、为局部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的一种社会行为。它可以是经济行为，也可以是政治行为和文化行为；它可以是个人行为，也可以是集体行为甚至某种全社会的行为。作为全社会性的短期行为，它可能爆发于某一社会解体和崩溃的前夕，也可能爆发于某种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短期行为，就属于以现代化与改革为标志的转型期中的短期行为。短期行为是以追求眼前利益为特征的，因此短期行为的大规模爆发，一定是出现于文化世俗化、社会性道德失范、政府宏观控制力衰弱、微观个体行为具有活力但又非规范化的时代。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恰恰是以放权让利、鼓励市场经济发展为特征的，各种经济成分和地方势力获得了发展的内在活力，但尚未发展壮大起来，片面追求短期利益是难以避免的。这时如果政府缺乏远见、处于腐败和无能的境地，就会使无数个体追求眼前利益的行为，汇成社会性的短期行为。鉴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贫乏，这种短期行为具有极大的危害。必须指出，改革和开放就其本质来说，是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在其初期出现一定程度的短期行为，也是正常现象，任何长远利益都是由许多具体利益组成的，并需要无数具有活力的个体通过对眼前利益的追求而最终达到的，可以说，没有眼前利益的追求，就没有长远利益的实现。我们所批评的，只是由于宏观失控和决策失误的原因，使个体行为盲目发展造成的对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损害。这种损害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非制止不可的地步。

一

经济领域中的短期行为，对我国人口、教育、农业、资源、生态、交通、能源、科技、消费、积累等各个方面，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1. 人口与教育

解放初期我国人口为5.4亿，到1989年4月为11亿。由于错误的人口政策，1962—1972年间，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年出生人口2500万人，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颇见成效，人口自然增长率1973年为20.89%，1984年为10.81%。但是1984年以来，政府放宽了对于二胎生育的照顾面、家庭承包责任制激励了农民的生育意愿，人口自然增长率1987年为14.39%，妇女总和生育率由1984年的2.06上升到1987年的2.45，1988年净增1500万人。

在未来的数十年中，人口数量将是折磨我们的长期问题。如果将总和生育率降到2.1，到2050年人口将超过15亿，达到我国土地资源承载的极限。如果总和生育率保持目前水平，届时将达18亿人口。同时，我国老年人口超过3亿，过剩劳动人口也超过了3亿，三大人口高峰同时到来，彼此叠加，相互恶化，后果极其严重。因此，无论在任何时期，因任何理由对

于计划生育的放松，都是不可原谅的有损于民族未来的行为。

在人口总量迅速增长的背后，还掩盖着人口素质的降低。一次对50岁妇女的抽样调查表明，文盲妇女平均生育5.86个孩子，小学文化程度的生4.8个，初中生3.74个，高中生2.85个，大学生2.05个。^①1981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妇女多胎率为40.34%，小学程度为26.91%，初中为9.29%，高中为3.38%，大学为1.6%，1988年北京市多孩率为1.79%，上海市为1.12%，而山西为17.1%，江西为21.49%，河南为17.01%。京津沪几大城市，人均国民收入在2000元以上，总和生育率在2.1以下；青海、云南、河南，人均收入在700元以下，总和生育率为2.99。^②城市少生，农村多生；文化高者少生，文化低者多生。当今中国，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残疾人，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13.07%，在3.3亿儿童中，智力低下者超过350万。^③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极大冲击，1978~1985年，全国小学毕业升学率由87.7%下降到68.4%，初中毕业升学率为30~40%，小学毕业生合格率为30%。近四年，中小学学生流失5000万，我国15岁以上的文盲为2.38亿，文盲率高达31.9%。初中教师不合格率为76.6%，教育经费被大量占用。^④教育质量降低，加上人才大量流失，必将造成我国人口素质退化的严重恶果。

2. 环境、生态与资源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由于经济发展快，占用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即可以较快解决污染问题。大规模治理环境污染时，美国人均国民经济总产值已达10000美元，日本已达4000美元，而我国在人均310美元的水平时，就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目前，我国年排放废水300亿吨、烟尘1000多万吨、二氧化硫1000多万吨、固化废弃物8000万吨，历年堆存总量60亿吨，占地5亿平方米。全国82%的江河湖泊受到污染，年损失370亿元，35个大湖中有17个遭受严重污染，381座城市面临水污染。80%的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域，造成大面积立体污染。城市大气总悬浮颗粒率日平均值超过国家标准，酸雨态势扩大，全国有1/3职工处于有损健康的噪声环境中，1.5亿人饮用污染水。农牧渔业产品综合环境质量指数已属轻污染程度，其中蔬菜、肉类已达中污染程度，受污染的耕地达1.5亿亩，1980年因污染减产粮食233亿斤，受农药严重污染的粮食595亿斤，年经济损失250亿元。1985年全国因污染损失达575亿元，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9.6%。

我国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是：先天不足，并非优势；退化污染，兼而有之；局部改善，整体恶化。我国人均耕地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林地为1/9，淡水资源为1/4。^⑤现在又承受着空前庞大的人口压力和前所未有的工业污染，面临着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破坏和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的双重发展危机。我国草原已有1/3严重退化，^⑥沙化面积不断增长，目前已达109万平方公里。土壤盐化1980年为1亿亩，到2000年将为1.2亿亩。水土流失总面积由解放初期的116万平方公里增加到现在的153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泥沙50亿吨，带走氮、磷、钾4000万吨，相当于我国化肥全年产量。陆地河湖日益缩小，自1954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天然面积减少了13000平方公里；鄱阳湖缩小了40%，约8万公顷；洞庭湖减少17万公顷；太湖

① 1989年4月14日《人民日报》。

② 1989年4月14日《人民日报》。

③ 1989年4月7日《人民日报》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在全国优生优育协会大会上的报告。

④ 1989年4月12日《经济日报》。

⑤ 1989年4月29日《人民日报》。

⑥ 同上。

减少16万公顷；江汉平原解放初期有湖泊1066个，8000平方公里，现只剩下326个，3000平方公里；罗布泊1931年面积为1900平方公里，1962年为660平方公里，1981年已经干涸；青海湖1966至1986年，水位下降3.2米。湖泊干涸引起下游土地沙化、地下水水位下降、树木大批死亡。^①1976至1980年，我国林地减少了1亿亩，现有17.28亿亩，森林覆盖率降到12%，大大低于世界平均22%的水平。森林消耗量大于蓄积量3.38倍，1985年林木赤字达1亿立方米。全国成熟林为20亿立方米，现年消费量4亿立方米，乱砍滥伐案每年超过2万起。到本世纪末，成熟林将消耗殆尽。^②中国生态环境还将继续恶化的原因是：庞大的人口增长及人均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张等。

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钢材、有色金属进口国。到2000年，国内现有铁、锰、铬矿山生产能力将消失10%；铜、铅、锌矿山生产能力将消失40%；60%的有色金属统配矿山的重金属生产已到中晚期。但盲目追求产值的短期行为却严重浪费着有限的资源。1953至1985年，国民收入增长9.1倍，能源消耗增长14倍，铁矿和有色金属消耗增长23倍。在全国1845个综合性矿山中，综合利用率达到70%的只有2%；3/4矿山的综合利用率仅为2.5%；废弃的伴生矿物价值往往高于主矿几倍至几十倍。我国煤矿回收率只有40%，近年来大力发展小煤窑，回收率不到20%。1979至1985年，山西省开发7000个小煤窑，1986年以后地方投资下降了40%，经10年乱挖，估计到2000年时将有1600多处矿井报废，小煤窑的回采率只有15~20%，挖1亿吨煤要丢掉8至10亿吨。我国能源利用率不到30%，为发达国家的1/2左右，我国每创造1美元产值，耗电量为日本的4倍、耗煤量为联邦德国的5倍和日本的4.4倍，比印度高65%。一边是短缺，一边是浪费，这就是我国资源、能源、环境、生态的总状况。

3. 产业结构

10年来，我们强调商品经济，鼓励地方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发展，忽视了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搞活与改革，也忽视了国家集中投资。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投资行为短期化和企业的小型化。企业承包后无长远打算，消费基金膨胀。为多分奖金，不少企业虚报利润，有些开支该进成本而不进，长期挂帐，设备维护管理弱化，超负荷，拼设备，企业只追求产值、利润指标，不顾技术进步、资产增殖、企业积累、职工培训，基础管理薄弱，原始记录与定额不全、工艺落后、计量不准。民主选举厂长和招标承包，都有利于短期行为而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企业10000个，总投资额200多亿美元，平均每个企业200万美元。规模过小导致缺乏规模效益和国际竞争力，使企业出现外汇不平衡。大量乡镇企业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企业短期行为，约有40%的乡镇企业成为严重的污染源，^③并大批占用了土地和国营重点企业的能源、原材料。

企业规模的小型化，必然引起产业结构的轻型化，一方面是基础产业投资减少，一方面而是轻工业、加工工业重复建设，仅外投资项目而言，重复引进的电冰箱、摩托车、彩电、洗衣机生产线多则数百条，少则数十条，大大超过了我国现阶段的需求能力和外汇支付能力。我国能源工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14.1%降低到1988年的9%，1989年上半年的电力投资比1988年同期减少了0.5%，运输邮电减少了3.1%，更新改造投资减少了2.8%。能源

① 1989年7月19日《经济参考》。

② 1989年7月14日《深圳商报》林业部长向人大提交的白皮书。

③ 1989年7月18日《经济参考》。

不足使30%的加工能力得不到发挥。基础建设投资减少的原因之一是放权让利。近年来预算外资金猛增,已相当于预算内资金的90%,而国家重点投资的80%是由中央投入的,地方和企业大量预算外资金很少对长远利益负责。^①

在各地方大上乡镇企业的同时,国家重点项目得不到保证。天津铝制品厂因无原料被迫停产。国家统配煤矿已经出现断层,在598个矿中,由于强力开发加速了衰老,开采期从60年缩短到25年左右,使生产段与开发段不能正常接续。煤价过低迫使煤矿用自有资金弥补亏损。一个大煤矿要建设8—10年才能投产,因此近年来煤矿投资的减少,正是欠下了2000年的能源帐。

交通运输严重滞后,货运只能满足需要的50~70%,客运超负荷在50~100%。^②1988年全国工业产值增长17%,铁路货运量只增长2.6%^③全国铁路失修线路1.5万公里,路基病9.6万处,机车到期未修达30%以上。^④设备失修造成了一系列重大事故。解放以来,交通运输邮电投资占总投资的15%以上,但1979至1986年间却下降为13.4%。五六十年代平均每年修建新铁路线1000公里,“五五”期间下降为500公里,“六五”期间下降到300公里。^⑤80年代,世界平均电话普及率为12%,亚洲为3.3%,非洲为1.51%,中国1987年为0.75%。能源交通通讯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由于商品经济与对外开放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短期行为,近年来不但没有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反而使长线更长,短线更短,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瓶颈”,就是农业。1978至1984年,由于农村改革的顺利推行,我国农业取得巨大成就。粮食产量年增5.4%,单产由529斤上升到733斤,人均占有量达到800斤;商品率由20%上升到33.7%。农民消费支出中的货币支出由39%上升到61%。专业户有450万,联合体有48万,集贸市场有7万个,批发市场1万个,国家定价由92.6%减少到35%。^⑥但是一直到1987年,粮食总产量仍停滞在4万吨左右,未超过1984年水平,人均粮食却降到745斤。粮食紧张,成本提高,“六五”期间粮食补贴由80.16亿元上升到227.41亿元,^⑦消费量却超常增长,1978年销售36亿斤,1988年销售62.4亿斤,1988年400亿斤粮食用于酿酒,使酒产量由1980年的215万吨增加到600万吨。1987年与1984年相比,城市居民消费的猪肉增加了11.7%,禽增加了26.7%,蛋增加了42.2%,这都是粮食的间接消费。今后中国的粮食格局,仍将是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到2000年需求为13575亿斤,而供给只有10000亿斤,加上进口500亿斤,仍缺粮2400~3600亿斤。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却连年减少,1985年比1979年减少了36.3%,占国家基建总投资的3.4%,为历史最低水平。农村集体积累明显下降。江苏省1982~1985年比1980~1982年,集体提留减少了26.6%,其中生产性投资减少了45.6%,个人投资则大量投入住房与个人消费。江苏农户总收入中用于农业固定投入的仅为10%,1986年人均建房开

① 1989年7月19日《经济日报》。

② 1989年12月26日《世界经济导报》。

③ 1989年4月2日《人民日报》。

④ 1988年7月22日《工人日报》。

⑤ 1988年12月26日《世界经济导报》。

⑥ 1989年1月9日《体改研究会通讯》。

⑦ 1988年7月10日《农村问题论坛》。

支226元,投入生产设备仅为10元,①宝鸡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986年比1978年增加了1.87倍,同时消费增加了3.2倍,住宅支出增加了3.08倍,可见用于生产的极少。②由此引起水利失修、基建停滞、机械老化,到1990年就可能出现生产断层。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农村生产基础的破坏。11亿人口,有耕地20亿亩,林地30亿亩,草原40亿亩,生存空间并不宽裕。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极大地鼓励了短期行为,平均每户8.35亩耕地,却分为多块,无法进行规模经营。1949年我国耕地14.68亿亩,1957年为16.77亿亩,1986年为14.43亿亩,比1957年净减2.34亿亩。③除国家、乡镇企业占地以外,私人乱占耕地极为严重。湖北省房县城关镇,1984年有耕地24032亩,1987年为17935亩,减少了1/4。1400户乱占1100亩,其中91户为干部占用。1978至1985年,灌溉面积减少了1275万亩,在80000座水库中有40%失修,农村灌溉设备包括机井、水渠,大部损毁,在8000万匹马力的排灌机械中,有1/4需要更新。

为了急功近利,许多农民滥用化肥,使土壤板结,地力衰退,肥效降低,1987年我国产化肥8064万吨,仅次于美苏。平均每亩施肥13.9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6.3公斤的1倍以上。④一向以勤劳著称的中国农民,已经懒于使用有机肥料了!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大批有文化、有技术的青壮年劳动力弃农经商做工,大批农业专业的学生与技术人员留在城市,如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对外开放

我国对外开放成就显著。“六五”期间对外贸易总额比“五五”期间增加了一倍,1988年出口总额超过300亿美元。到1986年底为止,共引进先进技术与关键设备1.4万项,用汇100亿美元;到1988年上半年为止,我国实际使用的外资累计达400亿美元,其中实际使用外国贷款295亿美元,批准举办外商投资企业1.2万个,同外国公司签订合同勘探开发海洋石油合同44个,外商已实际投资约100亿美元,通过“三来一补”、国际租赁与其他方式利用的外资有22亿美元。我国使用国外贷款与国内资金相结合,安排了200多个大中型项目,其中大多数是原材料、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工业和设施。利用外资增强了我国出口能力,外商投资企业1987年出口创汇10亿美元。对外开放还促进了国内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培养了大量人才,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总的模式,仍是追求产值和数量的外延扩大型,无论是国内经济还是对外开放,都存在着经济效益不高的现象。在外贸方面,财政补贴随着出口增加而增加,换汇成本不断提高,出现“出口贫困增长”;在外资方面,出现盲目追求“短平快”,不顾宏观效益的现象;在引进技术方面,出现重复引进、不注意消化吸收的现象,引进的重点没有放在增强自力更生能力上,而是企图用外汇买来一个高速度和高消费。日本在50年代初期,汽车年产量不过数十万辆,而美国已达到800万辆,但日本没有放弃发展自己汽车工业的努力,在20年内一举压倒了美国。日本很少引进国外直接投资,更不允许外国人掌握企业管理权,他们努力做的,就是引进先进技术、进口廉价原材料,以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能力。相比之下,我们就有许多短视之处,花费数百亿引进豪华汽车、支付高薪引进外国经理

① 《农业经济问题》,1988年增刊。

② 《农村问题论坛》,1988年7月10日。

③ 1989年4月《人民日报》。

④ 1989年4月15日《经济日报》。

人员、进口屡屡失控冲击民族工业、大盖高档宾馆维持虚假繁荣等等。有些人在对外交往中为了自己出国、挣高薪，不惜让国家受损，甚至丧失人格、奴颜卑膝、出卖灵魂。为向中央争优惠政策、争开放权力，各地区不断开展出口竞争、优惠竞争，让肥水外流、国家利益受损。这种不顾长远利益和宏观效益的“开放”，对国家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二

短期行为不仅存在于生产领域，也存在于文化、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其总的背景是商品经济所诱发的功利主义文化和社会世俗化。世俗化即神圣意义的丧失，它摧毁了已建立的以道德准则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剥夺了一切准则的神圣意义。在功利主义文化中，用来评价人、事物及行为的标准不再是道德与否，而是有用与否，它体现了对个人利益赤裸裸的追求，限制了道德对人的行为的约束作用。在世俗化背景下必然产生社会性的短期行为。

第一，社会性短期行为最初和最广泛的表现，是广大群众抛弃禁欲观和未来观，公然追求个人享受和现世幸福。

建国后的前30年我们用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在低消费的条件下迅速建立了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基础，国营资产由100亿元上升到8000亿元，工业产值从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上升到70%。近年来，被压抑多年的个人消费和享受欲望，一下子猛烈爆发出来。青年一代首先接受了世俗化的价值观念，将“忍受痛苦的能力”变为“追求快乐的能力”，主张“拚命地挣，使劲地花”。对外开放后西方生活方式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经济搞活后经理阶层兴起，模仿西方的工作生活方式，某些领导人也为高消费作出表率。使全民产生了“以前苦够了，现在该享受了”的信条，进而发展到迷恋洋货、崇尚出国和暴发贪欲。近10年来，一般消费水平迅速提高，饮食、衣着、住房、用具都有改善。全国每年有1000万台彩电、700万台电冰箱、1000万部洗衣机进入家庭，外加50万部空调器、50万部冷风机、1亿部电炊具和数千台电话。全民消费热不分档次、不分层次地迅速兴起。

高消费与对外开放相结合成为洋消费。经济特区首开风气之先，全国大进耐用消费品屡禁不止，人们鄙视国货而崇尚进口货，甚至不抽国产烟。大量外汇浪费到消费方面，并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欲望。

高消费与官僚主义相结合，就产生出庞大的集团消费。1980年我国集团消费为200亿元，1981~1983年为300亿元，1985年为400亿元，1987年为533亿元，1988年为665亿元，加上未统计数字，每年超过1000亿元，占财政收入的一半。集团消费的项目是：宴请，全国大中型饭店60—70%的营业收入来自公款；公费医疗，各种名目超支，年100亿；大建楼堂管所；进口小轿车，一个县的物资局，科级单位，竟有小车好几辆！^①公款旅游、出国；抢购名贵产品，无所不买。60年代以来中央下达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文件不下100个，效果甚差。外国人称中国是“公款消费的天堂”。

高消费与低素质、愚昧相结合，就产生畸形消费：修坟一个30000元，淫乱，赌博成风。1988年全国查处赌博案件20多万起，比1987年上升1/4，赌注上升到百元、千元甚至万元数万元。畸形消费是犯罪的温床，使社会治安恶化。从哄抢物资、毁坏林木到公开抢劫、杀人越货，有不少就是畸形消费欲望的派生结果。^②

^① 《瞭望》杂志25—26期。

^② 1989年5月23日《经济日报》。

有人认为中国人均消费仍属低水平,在中国无高消费,或认为只在某些阶层中有高消费。从绝对水平看,中国平均消费确实很低,但从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来看,中国人相对的生活水平已经很高。按某种打分法分析,中国社会发展总水平为世界第70位,国民经济总产值人均第105位,产业结构落后,1985年非农人口只为20%,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25%(世界低收入国家为35%)。与生产指标低下相对应,我国生活质量10个指标已经超过世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中国为51分,低收入国家为36分,中等收入国家为39分。我国生活水平偏高,更多不体现在现金收入上,而体现在衣食住行各种补贴上。1978年补贴共93.86亿,1988年为762.78亿,1989年为931.17亿,占财政收入的32.6%,如再增到40%,则达到财政危机的标准。大发补贴可以满足各利益集团的眼前利益、暂时缓和分配上的矛盾,从长远看必然降低生产率,产生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如作纵向比较,可以看出,我国消费的增长已经超过了生产的增长。1986年与1983年相比,工资总额增加71.5%,高于同期非农业部门社会总值增长56%的幅度。1984年到1986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1%,职工人均货币工资提高了61.2%,实际工资提高了33.3%。近年来积累率为30%以上,但大部分为消费性积累,消费加消费性积累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重,已由80%上升为85%,生产性积累只剩20%。^①这就必然损害我国未来的发展能力。

第二,短期行为导致文化近视症与道德危机,使精神文明建设产生“滑坡”,这是一种“人心的腐败”。

功利主义文化的兴起使人们重视实用技巧而忽视基础科学,理论、科研、历史、文化无人问津,研究生大批退学。人们看到少数人暴富,就丧失了凭本领艰苦奋斗的决心和毅力。知识不再受到重视,遵纪守法被认为无能。整个社会进入浑然无序、无规则可依的状态,道德评价与舆论评价荡然无存,精神文明建设滑坡,社会风气普遍败坏。赌博成风,封建迷信抬头,犯罪滋事,失去信仰,道德低下,思想混乱。某些顺口溜说道:“小偷小摸现代化(蒙面罩、戴手套、骑摩托),封建迷信商品化(集市上算命),聚众赌博社会化,流氓滋扰低龄化(15、16岁)”;“过去没钱不安心,现在有钱不放心”。从上海市几年前数百阿飞侮辱妇女到近日郟城县强奸妇女,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犯罪者无惧,围观者不少,却无人出来制止。

社会性文化近视症对社会秩序的最大干扰,就是民众社会动员过高,期望值过高,挫折感过强,在改革遇到困难时,就极易产生非理性情绪和政治行为。中国人的空想主义和民粹主义是由来已久的,往往对改革做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些人想象的改革开放,就是出国、发财、天上掉馅饼;有些人向往的商品经济,是一个完全自由平等的理想王国;有些人极力主张解放“人性”,认为解放人性就是解放创造力;有些人极力追求自由,认为自由可以实现人生价值。一旦改革需要人们付出牺牲时,一旦出现行政权力与商品经济的结合时,一旦别人的自由侵犯了他自己的自由时,一旦人的“恶的本性”充分暴露时,就出现了社会性的失落感、失望、苦闷、焦躁不安和对改革的不认同。农民在分地、进城时拥护改革,在计划生育、保护耕地、紧缩经济时又反对改革;工人在承包企业、发奖金时拥护改革,在优化组合、实施破产法时又反对改革;大学生在理论上思想上拥护改革,在国家不包分配时又反对改革。所谓“屁股指挥脑袋”,就是谁也不考虑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这种失望和维护既得利益的心

^① 《光明日报》经济学专版第340期。

态,进一步发展起来,就是牢骚、愤怒、逃离、绝望,必然演变为严重的社会心理危机,并为激进主义的政治思潮提供社会基础。

第三,短期行为削弱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加剧了腐败的发展,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与更大的短期行为。

现代化中的政治秩序和稳定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我国忽视了自身的优势,使政治上的短期行为不断发展。首先是片面地强调淡化党的作用,在实行党政分开时没有重视党在现代化建设中应承担的新的作用和责任。党在现代化过程中首先应该是理论、纲领、路线的制订者,现代化指向领导者;其次是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整合者;再次是防止腐败、制止短期行为的保证者。共产党的纲领以最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就必然要担负维护人民长远利益的任务。但是由于短期行为的泛滥,许多人把党的作用及其代表长远利益的功能,看成是阻碍改革开放的东西,因此要极力淡化党的作用。

其次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削弱,包括中央政府的宏观控制能力、中央对地方的指挥能力的削弱、干部队伍的松散、无能和腐败等等。在法律系统、人大系统和政府事务类公务员系统未能充分健全以前,推行人大选举行政领导人,如同在董事会制度和产权制度未解决以前推行厂长选举和承包制一样,必然产生短期行为。新上任的行政首脑往往注重于短期政绩,干几件在表面上有影响、得人心的“迫在眉睫”的事,很少关心跨任期的长远建设。这种表面上的“民主”很容易产生许愿、拉选票、笼络人心、附和多数、迎合潮流、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投机式“政治家”。

政府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另一失误,是没有及时解决干部队伍的选拔、精简、高效、廉洁问题,国家不能保证行政干部的收入,反而鼓励他们去创收,搞散了人心,加剧了腐败。在我国除了共产党组织以外,政府是又一支有组织的、拥有行政权力的防止短期行为的力量,政府能力的削弱必然使短期行为泛滥。政府的各种职能、各项法令是要人去执行贯彻的,如果执行者没有干劲、贪污腐化、渎职,就无法有效行使职能。近年来农村人口失控乱占耕地和治安不好,就是因为承包制以后,农村基层政权软弱无力造成的。县政权很难了解真实情况,村里人则互相包庇,多生孩子、多占耕地。甚至犯了罪之后,有权者弄权,无权者送礼,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样发展下去,实际上将使政府失去对基层的控制能力。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抓紧对短期行为进行揭露、批判和制止。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个人、企业对眼前利益的追求,也不能空作道德说教,我们甚至要承认短期行为在现代化初期出现的历史合理性,这是冲破传统体制和旧习惯势力束缚、进一步走向现代化的必要阶段。我们不能在反对短期行为时,又回到那种压抑个人活力和主动性、空讲长远利益的僵化模式中去,这样就会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向,眼前利益得不到,长远利益就变成虚无缥缈之物。我们现在反对短期行为,是基于下列理由:改革开放10年来,社会各个细胞已经具有活力;我们在解决社会控制问题时,应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少付出一些代价;更实际一些的,是由于我国生存空间狭窄、容不得短期行为继续膨胀。

要纠正短期行为,需要在理论上纠偏。近年来,一些同志一方面鼓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看不见的手”,一方面又照搬发达国家用高消费刺激生产的凯恩斯主义,恰恰颠倒了是非。我们需要借鉴的,恰恰应该是工业化初期勤奋、节俭、储蓄、创新的开拓精神和国家对现代化的强力扶持与引导。事实证明,靠市场经济的力量,既解决不了中国的生存空间问题,

也解决不了短缺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有利于民族整体和未来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党的领导。

要纠正短期行为，必须认真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重速度、轻效益的经济发展战略要切实修正，国营资产必须有人格化的代表，政府的权威和效率必须加强、腐败与无能必须清除、维护长远利益的各种立法必须健全。

要纠正短期行为，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准则，提倡职业道德、社区文化、遵纪守法、乐于助人、勤奋上进、艰苦奋斗，维护社会公德。

本世纪造成的共存空间困境，将在21世纪内长期地折磨中华民族。我们民族究竟如何实现现代化，究竟是优化还是劣化，究竟怎样才能保存民族精华和生存的自然基础、社会基础，而不是沉迷于暂时甚至是虚假的繁荣之中、给子孙后代留下祸患，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严峻的问题。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同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切实纠正各种短期行为，从根本上增强国力，使中华民族真正强大起来，屹立于世界东方！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农垦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 颖

北京市社会学会中日社会学分会成立

1990年4月21日召开的北京市社会学会年会决定正式成立中日社会学分会，作为其下属的专题研究会。

中日社会学分会的宗旨是开展中日两国社会学界的学术交流活动，推动中国的日本社会学研究，为提高我国社会学的整体水平作贡献。中日社会学分会计划开展下述活动：1.与日本日中社会学会建立对口联系，交换两国主要社会学刊物；2.介绍、交流两国有关研究成果和出版信息，筹划两国社会学者的互访活动以及专题学术讨论会；3.设立课题，实施共同实地调查和共同研究。

目前，中日社会学分会正在发展会员，凡赞成上述学会的基本宗旨，有志于中日社会学交流研究，并已具有相当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者均可申请入会。该会预计每年定期召开一次年会，必要时举行临时会议。

北京市社会学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沙莲香、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李国庆负责中日社会学分会的组织工作，秘书处设在北京市社会学会内，通信地址：阜外车公庄大街六号四号楼，邮政编码：100044，联系人：陈应瑞。

1990年6月3日应邀出席日中社会学会第二届研讨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向日本社会学界同仁通报了中日社会学分会成立的消息。

(李国庆)